

如何组织民众

——重读刘少奇《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

□ 许 江

1939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期发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文，回答了抗战时期“怎样使大多数民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即“如何组织民众”这一基本问题。文章关于如何组织民众问题的论述，不仅为抗战时期动员组织民众提供了基本遵循，而且对当前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具有现实意义。

动员组织民众“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动员令，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组织发动民众是抗战的重要任务，也是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刘少奇对此也持有相同看法，正如他开宗明义所强调的，“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抗战爆发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的呼声“已经遍于全中国”。地方党组织和“动员委员会”积极响应，“从事民众运动”，“发布了不少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法律、命令”，但他调研发现，全面抗战爆发“将近两年”，全中国除了华北等少数地方外，其他地方没有广泛开展民众运动，大多数民众并没有被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这“在抗战中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如何组织民众呢？刘少奇从民众运动本身出发，提出在组织民众中，只有遵循“要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和“要采用各种

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等基本原則，才能把大多数民众成功地组织起来。

“要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

刘少奇认为，认识了解民众是组织民众的前提，只有认识掌握民众运动的规律，才有可能引导民众组织起来。民众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因此必须从民众的自动性出发使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而不能任意去组织他们。那么如何实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呢？作为民众中的先觉者，我们有责任不断提高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他们的觉悟，使民众了解和认识到他们有组织起来救国与自救的必要性，发挥民众的自动性和积极性，然后推动、协助和引导民众组织起来，这样民众就能真正组织起来，而且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他们态度会很坚决，“即使你不让他们组织，他们也会多少组织起来，不能公开组织，他们也要秘密组织起来”；反之，如果采用强迫命令，就会抑制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民众不但不会组织起来，甚至有可能与强迫者发生矛盾冲突，走向对立面。在启发民众协助民众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刘少奇还特别提醒，领导者应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应当“以兄弟的、同志的态度去对待民众、说服民众”，才能真正提高民众的觉悟和自动性，才能真正成为民众的领袖，“才能真正的、最后的把民众组织起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最后，他还强调，真正坚强的民众运动必须强调纪律性，但这种纪律是建立在民众自觉基础上的，是民众了解、承认和自愿遵守的在民众运动中不可或缺或纪律，是自动的、自愿的、暂

时牺牲自己主张服从多数人主张而保持行动一致的纪律，而不是依靠强迫遵守的纪律。

“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

民众不仅是有思想的人群，而且还是“有要求的人群”。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注意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如果解决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而群众也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拥护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号召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刘少奇也持有相似观点和看法。他指出，任何离开民众要求去组织民众必定会失败，而注重并达到他们共同要求，他们会自发组织起来。我们在实际组织民众工作中，不能试图变更甚至放弃既有的民众团体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团体组织的任务与主要要求，而是要妥善对这些团体加以引导，来吸引更多民众参加，使民众组织起来。比如，在经济组织中，任何群体中的民众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经济要求，那么我们应注意在民众各种经济要求上去组织他们，把有共同经济要求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以达到组织最广大民众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可以加以政治口号与政治要求，否则，只是单纯用政治口号去组织民众，那就不能使大多数民众真正组织起来。当然，除了民众自身要求外，我们还可以结合抗战要求，通过宣传解释工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组织民众亲身实践和参加实际斗争工作，让他们亲身体验到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个人要求与国家民族要求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以此启发和提高民众的要求。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使民众接受我们的要求，而且他们会把我们的要求和口号变为自己的要求和口号，他们会走向更高的阶段，参加抗日救国。总之，一定要重视民众的要求，“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否则“民众永远也不会在

你们领导之下抗战的”，甚至走向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民众的敌人。

“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

民众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要求、职业、年龄，来自不同地域、阶层，文化觉悟程度等也不尽相同，刘少奇认为，民众内部的这些复杂性决定了民众组织方式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组织民众过程中必须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否则企图用单一方式把来自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民众组织在一起，过共同组织生活，必然是会失败的。那么我们如何从组织方式上来区别民众组织的分散而不要统一”。民众运动必须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众内部复杂情形基础上采用各种各样方式去组织民众的大多数；是建立在民众组织各部门中，在共同要求上取得工会、农会、妇会以及青年团体等各种组织的统一；是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联合一切民众团体，组织统一的救国总联合会，并在各地同样建立这种联合会的系统。这样就能在抗日救国共同纲领基础上，把有共同要求的一切民众组织统一在一个总领导机关之下。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众内部的复杂性，并对各部分民众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进而采用看起来似乎是分散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才能把大多数民众广泛地组织起来，才能够有真正统一的民众运动。

重读經典

用典释义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讲话原文】

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美国的爱迪生、福特，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等著名企业家都既是管理大师，又是创新大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创新就要敢于承担风险。敢为天下先是战胜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需要弘扬的品质。大疫当前，百业艰难，但危中有机，唯创新者胜。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在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习近平：《在企业界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7月21日）

【出处】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战国）《周易·系辞上传·第五章》

【解读】

“盛德大业”是《周易》提出的圣人标准。何谓“盛德”？何谓“大业”？《周易》认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

之谓盛德”。对此，唐朝经学家孔颖达疏曰：“广大悉备，万事富有，所以谓之‘大业’；圣人以能变通体化，合变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极，故谓之‘盛德’也。”

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解释与孔颖达有很大不同。他说：“富有，广大不御之盛与！日新，悠久无疆之道与！富有者，大而无穷也；日新者，久而无穷也。”张载以“大而无穷”解释“富有”，不像孔颖达强调“富有”的物质层面，而更侧重其精神层面。因此，真正的“富有”并不只是财富的积累，它应囊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故而成就“大业”。同时，张载以“久而无穷”解释“日新”，不像孔颖达强调“日日增新”，而是强调“日新”的永续性和长存性。张载还进一步解释道：“惟日新，是谓盛德。义理一贯，然后日新。”指出“日新”本身就是“盛德”的体现，只有一以贯之坚守义理，才能在“久而无穷”中达到“日新”。

因此，这两句话可以解释为：广泛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叫作弘大功业，持续永远的日日增新叫作盛德行。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在谈到创新精神时，他用“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勉励大家，指出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他鼓励企业家勇于创新，并语重心长地说：“大疫当前，百业艰难，但危中有机，唯创新者胜。”

（杨立新）



范文澜（1893—1969年），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呕心沥血，撰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潜心治学、严谨求实的学风，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传承。

实事求是，根除一切虚饰浮华

实事求是，根除一切虚饰浮华是范文澜治史的基本态度。他一生潜心治学，并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治学格言。

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力戒虚夸的治史态度，主要得力于他的两段经历。一是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老师黄侃、刘师培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家“实事求是，无微不信”的严谨治学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二是他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受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教

育，对于教条主义者因为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凭“想当然”办事而造成的危害深以为戒。从此，在治学上更加恪守“充分占有材料，通过联系和分析，去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正是基于此，范文澜才铸就了一生笃实求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本色。

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勤奋著述，使范文澜的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在晚年，他用20多年时间，不断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改和完善。据他对《中国近代史》1949年前后多种版本所写的“说明”可知，在5年之中，集中修订3次。对于《中国通史简编》，从1951年到1965年，中间除了因病无法工作外，其余时间，他都以惊人的毅力，认真细致地进行修订，实际上是以十几年功夫重写。《中国通史简编》有诸多学术界公认的特色：资料极其丰富；训诂依照故训，解说严谨；文字锻炼纯熟，有着中国古代卓越史家“文史兼通”的风范。《中国通史简编》追求实事求是、考订详核、文字表述准确质朴，体现了古文经学家的治学风格。

1957年3月，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指出：“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

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尚，死后可以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功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史学界的空疏学风和“左”倾思潮，范文澜呼吁树立严谨求实学风，主张全面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他强调必须认真读书、潜心钻研、坚持不懈，舍此便毫无学术上的建树可言。1961年3月，在纪念巴黎公社成立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反对放空炮》讲话，严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神似”

范文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神似”，要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注意探究中国历史的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民族

的，必然带有中华民族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它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结果，一是它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二是它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根基有相通的思想因素。范文澜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方面，中国历史学界曾出现教条主义偏差。1957年3月，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范文澜鲜明提出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有立。”他称教条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

范文澜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不要“貌似”。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也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注重掌握其精髓，学会运用其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不要把其作为公式、教条，不顾实际、不问对象到处套用。在历史研究方面，他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等四个问题，勉励后学。

范文澜对“西周封建论”的进一步论述、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看法、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重要观点，以及明确反对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分期标准的态度和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无一不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运用和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的显著风格。

坚持学术自信和独立思考

范文澜在治学中坚持学术自信和独立思考，坚持写真实信史，反对见风使舵、随波逐流、曲学阿世。

针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搞“运动”，大学里出现了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于历史问题看法的不正常情况，范文澜强调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

放弃。”在当时，这样坚持学术自信，明确地提出把“我”大大恢复起来，以客观实践为检验一切的标准，确实具有石破天惊的力量！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开展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部族变成民族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事情。范文澜认为秦汉时期汉族已形成民族，是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范文澜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不惧压力和风险，表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

范文澜治学坚持自信，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中国通史简编》原是按照毛泽东指示，为向党的干部和群众普及中国历史知识而撰写的通俗读本，开始是集集体编写，计划写十几万字，因为观点和文字不能统一，最后由范文澜独立著述，文字也写到60多万字。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是反映范文澜“独断之学”的一部通史。当时，有学者这样评价他：“范老虽然待人接物态度谦和，但在治学态度上却受章太炎影响（他是章的再传弟子），比较自信，不轻易接受不同意见。”范文澜的谦虚是真诚的，但他的自信和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也是实实在在的。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的著述，不论是延安版还是新中国之后的修订本，都彰显出他深厚的学术底蕴，带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风格。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部分，更能映照出作者的国学大师功力。其文笔之炼达，绝非等闲之辈所可及。